

3月6日下午,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,厉以宁、李毅中、陈锡文、林毅夫、杨凯生、常振明、贾康等7位全国政协委员,围绕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等问题,为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出谋划策——

加快改革,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

本报记者 陈果静 黄鑫 欧阳优 何川



3月6日下午,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,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、李毅中、陈锡文、林毅夫,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、常振明、贾康,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。《经济日报》和中国经济网记者(下图)就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问题提问。

本报记者
赵晶摄



加,但和国际同行业相比,其不良贷款比例仍是偏低的,资产质量水平仍然较好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必唱空中国银行业。

据测算,2014年,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元左右。截至去年底,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为1.25%,虽然较前年的1.03%有所提升,但还不算太高。

“英国《银行家》杂志去年曾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,30家大银行中除去中国的银行,剩下20多家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是3.96%。因此,与国际同行业相比,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,资产质量水平良好。”杨凯生委员说。

对于将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,杨凯生委员认为,这将取决于银行抵御风险、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如何。据介绍,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230%,也就是说,每1元钱的不良贷款,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2.3元钱来应对不良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。

此外,目前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.18%,也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。更重要的是,其中核心资本比率超过10%,这在国际同行中又是领先的。“在这样的情况下,看空中国银行业似乎不必要,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没有什么道理。”杨凯生委员强调。

常振明委员——

激发国企活力靠改革

国企一直被诟病效率低下,国企改革也因此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。“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画等号。”身在国企的全国政协委员、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列举了一个数字,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有92家,这正是国企在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。

常振明委员认为,在评价企业效率时,除了看经济效益,还要考虑社会效益,比如高铁、石油、电信主干网、北斗导航、大型运输机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,具有投资大、社会影响大、回报期长的特点,就需要国企来完成,可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。随着我国市场化等多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,国企和民企间将会有自然分工,各有适合的领域。

“中国企业的基因是国企。”常振明委员说,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,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都是国企,做大、做好和做强国企,也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。

常振明委员并不否认国企存在很多问题。他认为,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,要靠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透明的考核机制等方法来解决;一类是体制机制问题,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。

如何深化改革、激发国企活力?常振明委员给出了“三招”:政企分开、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。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,分类推进改革。对此,常振明委员解释说,每家国企的情况千差万别,需要界定其功能。公益型的国企应该更注重社会效益,而竞争型和商业型的国企则应更侧重经济效益,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。其中,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。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。

“政企分开,是国家对国企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。”常振明委员说,资本是有属性的,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,这样就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,国家通过资本纽带来行使管理的权力。

而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,则能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。常振明委员指出,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,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十分必要,要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。

“我相信,深化国企改革将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,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。”常振明委员说。

贾康委员——

财税改革面临三大任务

“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‘开场锣鼓’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,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,财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支柱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,财税改革方案也是率先获批。

2014年,财税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。预算制度改革力度明显加大,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速。此外,继在10个省市开展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之后,财政部还探索建立“借、用、还”一体化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。

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是什么?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?“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,现在面临3大领域的改革任务。”贾康委员认为,首先是预算改革,要提高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,让老百姓有知情权、质询权、建议权和监督权,这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。同时,贾康委员提出,必须明确全口径预算,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,不准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。预算体系还要有具体合理的形式,今年开始采取3年滚动预算。还要有一些技术的配套,如必须引入权责发生制,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覆盖表,等等。此外,转移支付方面必须做制度改进方法的优化,如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,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等。“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给专项资金做资金配套,这容易逼着地方政府在配套上弄虚作假。”贾康委员说。

第二大领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税制改革。已经推进的“营改增”改革,按照时间表今年要争取全覆盖。“这样更有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、公平竞争,配合着结构性减税,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。”贾康委员表示,与此同时,资源税、消费税、房地产税、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推进。

第三大领域的财税改革任务,涉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样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的问题,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,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。

在谈及地方债问题时,贾康委员表示,“针对地方债问题,今年有一套阳光化、非常透明的制度安排。”贾康委员表示,地方债已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,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比较长期的、低成本的规范债务,为地方债“开明渠、堵暗沟”。

全部流转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,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%,这一进程正逐步向前推进。”陈锡文委员说。

林毅夫委员——

“对中国增长预期没有调整”

“我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没有调整。”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,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他的这一判断,此前他曾数次就此公开表述。

林毅夫委员之所以如此坚定,缘于他提出的“后发优势”理论。“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,而其基础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。发达国家是这样,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。”林毅夫委员解释道,由于发明成本高、风险大,发达国家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,平均每年增长在2%至3%之间,而发展中国家利用“后发优势”,引进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,成本和风险得以大幅降低,经济增速可能比发达国家高2倍甚至3倍。“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,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都有9.7%的增长。”林毅夫委员说。

30多年后,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?林毅夫委员认为,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。

他介绍说,日本、新加坡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,实现了20年平均8%至9%的增长。“他们所实现的就代表一种可能,所以说我们是有潜力的。”林毅夫委员认为,这意味着从2008年起,我们仍有实现20年平均8%增长的能力。但是,由于近年来全球还未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,拖累了我国出口,“‘三驾马车’有一驾跑慢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8%。”林毅夫委员说。

还有人质疑,我国过去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等中低端产业,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,那么,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?林毅夫委员对此充满信心,“我们当然还有比较优势。”

他所说的比较优势来自于这样几个领域: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装备制造业,以及电子产业、材料产业、精密仪器等;互联网的新业态,如互联网金融、电子商务、快递业务等;绿色环保产业、新能源产业等。“传统加工业则可以转移出去,进而扩大我们的机器设备、中间部件的外销市场。”林毅夫委员认为,借助“一带一路”东风,随着我国加大对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,像水泥、钢铁、电解铝这样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需求也能有所加大。

“我相信,在新常态之下,我们有实现8%增速的潜力,达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讲的7%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。”林毅夫委员表示,如果我们做得好,会比7%还要高。

杨凯生委员——

唱空中国银行业没道理

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提升,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问题受到关注。对此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,虽然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会增

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、产业转移、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等,以促进我国工业健康发展。对此,李毅中委员表示,这些措施都是对工业自身结构的调整,并不能看成是工业的弱化。

2013年,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。2014年,两者差距又显著拉大。对此,李毅中委员表示,“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产品、商品,提供了服务对向。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,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的退出,这个关系要处理好。”

李毅中委员还表示,工业占了全社会能耗的70%,也是主要污染源。所以,工业要进一步节能减排,调整能源结构,保护生态环境。但是,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忽视或放松对工业的重视和投入,以至于使它边缘化,那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。

政府工作报告让李毅中委员振奋的是,李克强总理用了很长一段篇幅讲制造业,特别是“中国制造2025”,体现了中央对工业的重视,对制造业的重视。

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,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任务,也是全面小康的支撑、改善民生的基础。“工业承担着‘两个百年’的重任,工业的主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。”李毅中委员说。

陈锡文委员——

创新试点促农业现代化

推进农业现代化,改革是关键。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记者会上表示,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,加快建设现代农业。

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,中央一号文件已做了整体部署,并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动力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,要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,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宅基地制度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。在改革中,要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、质量不下降、农民利益有保障。

针对土地征收、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,陈锡文委员表示,中央已正式发布文件,在全国选择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。这些改革试点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条款,国务院已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,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,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,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。

“通过试点,最后确定暂时突破法律条款,允许这些地方在暂时不执行的3年后进行综合评估,看这种突破是不是更加符合实际需要,是不是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,并借此修改现行的法律条款。”陈锡文委员表示,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,那就继续恢复实行现在的条款。

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,陈锡文委员表示,目前,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,包括山东省、安徽省和四川省,这3个省是在全省开展试点,但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。

“据了解,大概95%以上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,涉及3.4亿亩的土地,已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这种情况下,土地流转也在加速。根据有关部门在2014年6月底统计,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大概是3.8亿亩,占到28.8%。把土地部分和

厉以宁委员——

新常态意味新变化新机遇

经济进入新常态,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引擎是什么?

在全国政协常委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、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看来,回答这一问题,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新常态。他指出,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3个内容,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;二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,传统产业要切实转型升级;三是寻找经济新动力。过去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扩张、靠投资驱动,已不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。“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?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活动。”厉以宁委员语气稍重地强调。

新常态意味新变化,也意味着新机遇。2014年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战略构想,强调要做好“一带一路”总体布局。同时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“一带一路”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,强调把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。这些都为新常态下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。

厉以宁委员对此感触颇深。谈到新常态下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时,他强调关键是制度创新。在这一过程中,有3个关键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。其一,贸易和投资应并重。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发展,既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,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投资。而应该是,适合于投资的就投资,适合于开展贸易的就贸易,贸易和投资并重。其二,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,特别是在做好经济带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。其三,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是应有之义。“各国拿出相互信任和诚意来,‘一带一路’就一定能够搞得更好。”厉以宁委员的话掷地有声。

李毅中委员——

防止工业边缘化空心化

对于记者所提出的工业边缘化、空心化的问题,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,工业肩负着我国“两个百年”重任,是服务业的重要基础,要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,防止工业边缘化、空心化。

李毅中委员坦言,过去有一段时间,我国确实存在过脱实向虚的问题,表现在资本转移、生产要素流出、人才流失、企业效益不够好等方面。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,并做出了大力支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决策。这几年,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,上述情况已经有好转。

“政府工作报告里有3个地方提到了实体经济,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,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。”李毅中委员说。

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4年,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.8万亿元。但李毅中委员表示,我国工业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,有待提质增效、转型升级。

目前,我国工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包括淘汰